

总 序

汉族中的客家民系或曰客家族群,发祥于我国中原大地。由于政治、军事、经济等原因,早从秦汉时起,他们的先人就从中原不断往南迁徙,定居和繁衍于南方各个省(区)。进入近代以后,锁国封关的局面被打破,客家人本其勇于开拓进取、能够吃苦耐劳的精神,漂洋过海、出国谋生者也不少。他们在艰苦的创业过程中,也为居住的省(区)或国家的社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19世纪40年代起,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和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以致国权丧失、民族阽危。国难当头,客家儿女又本其热爱祖国、不畏强暴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道,奋起开展反对封建压迫、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在维护民族尊严、争取国家独立、探索国家富强的道路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中外人士的瞩目和赞许。因此,在19世纪末年,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对客家问题的关注,到20世纪20年代及其以后的几十年间,在以罗香林为代表的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开展了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在大陆各个客家省(区),客家联谊社团的组织,客家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世界客属恳亲活动的开展等,使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

广西师范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成立于2004年6月,得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赞助。它的宗旨是:加强和海内外客家乡亲以及从事客家研究同道们的联系,为弘扬客家历史文化、增进各族和各国人民的团结、促进祖国建设大业尽心尽力。为此,我们在做好客属日常联谊工作的同时,将在中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以地域、人物和客家历史文化的个案研究为主,组织编写并出版客家研究系列丛书。

一是“客家区域文化”丛书。它以国内的几个客家大省(区)和客家移民较多的国家为基点,以一省(区)、一国一书的形式,分别研究该地客家人的历史和现状,他们与周邻居民的交往、发展、变化以及相互认同等。通过区域“客情”的调查研究,为了解全国以至世界“客情”创造条件,从而使我们对客家民系的全貌得到比较真实和全面的认识。

二是“客家著名人物”丛书。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当代,涌现出不少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领域的著名客家人物,他们或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国际交往中,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乃至宝贵的生命,为祖国的独立富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研究并为他们分别立传,目的是为后来者树立榜样,奋发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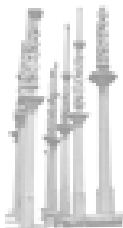
三是“客家文化综论”丛书。客家历史文化的许多重大问题,学界已经做过不少研究。但是,当代社会正处于全面变革的进程中,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日益频繁,彼此吸纳无所不在,因此,我们对客家的研究也必须与时俱进,以文献资料与社会调查相结合,以理论创新与研究方法创新相结合,综论客家文化的重大问题,既看到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本,又理出客家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在对外交往中出现的新事物,使我们的研究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三套丛书,归宗于“客家研究”一个大课题。我们希望: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客家文化资源,拓宽研究视野,深入问题探索,立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努力写出课题新意,使研究成果具有自己的特色。我们深信:有广西师范大学领导的关怀和指导,有海内外客家乡亲和我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通过各方同道的共同努力,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开展交流和讨论,就可以逐步取得对问题的真实理解,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好的现实意义。

我们的工作正在起步。瞻望未来,任重道远。我们将全力以赴,做好工作。谨以至诚,祈求方家和读者朋友们的及时批评和指导。

“客家研究”丛书
总主编 钟文典
2004年10月28日



目 录

引言 / 1

第一章 汀江流域的开发与客家民系的形成 / 10

一、中原、江淮人民迁入赣闽粤交界区域的历史回顾 / 10

(一) 赣南 / 12

(二) 闽西南 / 16

(三) 粤东 / 19

二、唐宋时期汀江流域的开发 / 23

三、意识形态的整合——定光佛信仰的形成与传播 / 32

(一) 与何仙姑斗法 / 36

(二) 佛道合流 / 37

(三) 化及异类 / 37

四、语言风习的整合——闽西独特文化面貌的形成 / 41

五、闽西在客家民系形成阶段的核心地位——附论石壁现象 / 46

第二章 福建客家的发展壮大 / 55

一、宋代客家与畬族的互动 / 55

- 二、客家与畬族人民的联合抗元斗争 / 59
 - (一)福建客家与畬民支援文天祥、张世杰抗元 / 59
 - (二)黄华畬军 / 60
 - (三)陈吊眼抗元始末 / 62
 - (四)传奇巾帼英雄许夫人 / 64
 - (五)元代中后期闽西南人民的抗元斗争 / 65
- 三、元明时期福建客家的的发展 / 67
 - (一)元代畬族汉化进程 / 67
 - (二)明代福建客家与畬族的互动 / 72
 - (三)客家人向博平岭东麓发展 / 84
 - (四)福佬客问题 / 88

第三章 福建客家社会文化面貌的演变 / 90

- 一、宋明理学在客地的传播 / 90
 - (一)闽学在福建客地的传播 / 90
 - (二)阳明心学在福建客地的传播 / 95
- 二、福建客家宗族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 98
- 三、客家民风由“野”向“文”的演变 / 106
- 四、客家崇文重教风气的历史考察 / 115

第四章 福建客家人的对外拓展 / 123

- 一、向粤东、粤中、粤北发展 / 123
 - (一)移民粤东 / 123
 - (二)拓展粤中 / 125
 - (三)拓展粤北 / 129



- 二、倒迁入赣 / 132
- 三、向大西南发展 / 139
 - (一)移殖四川 / 139
 - (二)移殖广西等地 / 154
- 四、向浙南、浙西山区发展 / 155
 - (一)入迁浙南山区的福建客家人 / 156
 - (二)入迁浙西的福建客家人 / 159
- 五、渡海迁台 / 160
 - (一)福建客家人迁台的历程 / 160
 - (二)客家人渡台的方式和路线 / 168
 - (三)福建客家人在台湾的分布 / 171
- 六、向东南亚发展 / 173

第五章 近现代福建客家社会的变迁 / 178

- 一、社会经济结构的局部变革 / 178
 -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 / 178
 - (二)商品经济网络的形成 / 184
- 二、现代化的最初步伐 / 188
 - (一)民主政治的最初觉醒 / 188
 - (二)现代经济的成长 / 192
 - (三)新式教育的兴起 / 194
 - (四)胡文虎的现代化计划和实践 / 198
- 三、西方宗教的传入及其影响 / 199
 - (一)西方宗教的传入 / 199
 - (二)教会兴办的教育事业 / 203
 - (三)西方教会对社会进步的推动 / 206
- 四、苏区时期闽西客家的新气象 / 213

第六章 福建客家传统文化习俗 / 220

一、宗教与民间信仰 / 220

(一) 宗教 / 221

(二) 民间信仰 / 223

二、风俗习惯 / 233

(一) 婚姻习俗 / 233

(二) 丧葬习俗 / 239

(三) 生活习俗 / 241

(四) 生产习俗 / 243

(五) 饮食习俗 / 244

(六) 传统服饰 / 247

(七) 传统民居 / 248

三、客家山歌 / 256

四、传统观念 / 265

(一) 门第观念 / 265

(二) 中原正统观念 / 266

(三) 风水观念 / 266

第七章 福建客家英杰 / 270

一、士绅翘楚 / 271

二、书画奇才 / 292

三、当代之雄 / 299

引 言

客家研究开展百余年来,以当今的一个省区为范围,系统地分区域研究各地客家,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也是客家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标志。分区域研究客家,其优点是可以把事情讲详细讲准确。比如讲客家人的分布,任何一位学者都很难把全球范围的客家人分布搞得很清楚很准确,但由某一省区的学者或某一省区的学者群论本省区的客家人分布,就有可能把情况调查得很清楚,讲得很准确。又如讲客家方言和民俗,各地的情况大同中有小异,某一省区的学者笼统地讲客家方言和民俗,很容易以点代面,把本省区客家方言和民俗的具体情况看成是整个客家方言和民俗的普遍现象,而分省区来做,就可以避免这样的片面性,就能够把本省区客家方言和民俗的具体特点细致地描绘出来,并归纳出相应的概括性认识或相应的结论。如此等等,说明分区域研究客家很有必要,很可能在某一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具体做起来,各种问题就纷至沓来了。首先是关于客家、客家人、客家民系、客家文化的界定和认识问题。这是分区域研究客家的前提和出发点。不同的界定、不同的认识会带来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取向,

还可能导致很不相同的结论。其次是研究性质的定位或研究成果的期待值问题。我们说分省区系统地进行客家文化的区域研究还只是一种尝试,并非说以前都没有进行过区域性的客家文化研究。实际上,在某一范围内就某一特定的专题开展客家研究,已有大量的学者做过,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果我们这次的分省区客家区域文化研究只是把相关的专题研究进行归纳整理,只期望达到使已有成果更系统更全面的目的,那自然可以组织相关的学者,分门别类,分头负责,下一番收集、整理、提升的工夫;但如果我们所期望的,是用区域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某一省区的客家文化现象进行新的审视,借以对旧有的观点和结论进行深入的剖析和严格的验证,期望发现新颖的视点,得到崭新的结论,其做法就大不一样了。

我想,既然是尝试,就不可能等大家观点统一以后才行动;既然是尝试,就不妨各省区的做法不强求一致,而是各尽所能,各显神通。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把本书的研究定位为:在区域社会研究理论指导下的全新的客家区域文化研究,其特点是把客家民系的形成放在汉族从中原向南方推展的大背景下,从移民史、民族关系史、文化传播与变迁、汀江流域的开发与区域经济文化从中心向边缘推展的地理过程等角度,具体探讨客家民系如何在福建形成,福建客家如何发展、壮大,其经济、社会、文化面貌如何演变,力图把汀江儿女的千年奋斗史生动形象地呈现给读者。

这是一个完全个性化的设想,要开展的是一项完全个性化的研究,所以我只能独自勉力为之,还不可能汇集一批专家协同作战。唯一例外的是第七章“福建客家英杰”,这一章的第二、三节专业性很强,我分别约请了闽西书画家章彬辉和曾在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工作过的文学博士肖剑南执笔。

个性化的研究,可以尽量多发挥自己的创见,不必为了体系的周全而照顾方方面面,也可以尽量地扬长避短,多在自己擅长的领域着力,自



己不熟悉的领域则少说或不说。譬如方言问题,我所擅长的是根据文献资料钩稽考索,论证客家方言最早在何时何地形成,并以之作为客家民系何时何地形成的重要佐证;至于福建客家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各个方言调查点的注音,语言材料的分类比较等问题,我是门外汉,说不出什么新鲜观点,最多只能把别人已有的成果稍作归纳而已,这样我就干脆不说。又如,关于福建客家传统文化习俗,按照惯例应分门别类就宗教、信仰、民俗、文艺等事象一一介绍,但我觉得简单的分类罗列意义不大,倒不如就若干重要的民间文化事象做一番考述源流、论证特点的工作更有意义。所以在这一部分,我不求所述的事象全面完备,只求将某些重要的或人们有误解的事象说清楚,使人们对其源流和特点有正确的认识。

客家精神或客家文化的特质是个热门话题,但也是一个最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不应该主观地定调子,不能把它说得玄而又玄,而应按照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从客家人生活的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中,从客家人的生活经历和斗争经历中去概括提炼。其实这一点古人倒有比较客观的论述,例如南宋《临汀志》论及汀州的风俗,说:

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汀,山峻水急,习气劲毅而狷介,其君子则安分,义励廉隅,耻为浮侠;其小人则质直果敢,不以侈靡崇饰相高。然经界未行而赋役偏,舟车不通而商贾窒……是以积贮有限,服用无华。外邑山谷之间,亦时有弄兵珥笔为里閭挠者,旧志谓无险隘荒陋,轻生尚武,人情不甚相远。^①

这里既指出了汀州人习气劲毅而狷介,读书人安分守己、廉洁重义,劳苦群众质直果敢、艰苦朴素、轻生尚武、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特点,又认识到这种特点与特定的自然环境(山峻水急)和社会条件(经界未行赋役偏、舟车不通商贾窒、积贮有限)有密切的联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不公、商品经济不发达、物质生活水

^① 南宋胡太初修、赵与沐纂《临汀志》,2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按:引文中“旧志谓无险隘荒陋”一句,“无”可能是衍字,“旧志谓险隘荒陋”于理较通。

平低下这样的生活条件造就了汀州客家人的特殊人文性格。其他不少方志中也有类似的认识,这些认识具有朴素唯物论的倾向,值得我们借鉴。现在有些论著,脱离客家人在赣闽粤边大山区中特定的生活环境和宋元明清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斗争经历,把客家精神和客家文化特质说成是古已有之,或说是从中原带来的,而且不区别客家民系与汉族其他民系的不同特点,把中华民族共同的美德等同于客家精神和客家文化特质,只看到中华民族的共性,抹杀了客家人的特性,这样的看法,反倒不如《临汀志》等方志说得客观和切实。

鉴于客家精神和客家文化特质的问题比较抽象,要对它作深刻而精确的概括,还有待研究的深入,本书不拟急急忙忙把福建客家人的精神和文化特质概括成若干条条,而是尽量详细地阐述福建客家人的生活环境与斗争经历,并通过详尽介绍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福建客家杰出人物的表现,他们的功业、事迹、言行、精神风貌,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和感受。

以上是关于本书体例和研究取向、研究特点的若干说明。闲话既毕,本应言归正传,然而如前所述,客家民系的界定问题是进行客家区域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这是一个全局性和总体性的问题,又是一个分歧多多的问题,应该说但不宜于放在福建客家形成发展的具体论述中说,所以在进入正题之前,还要先就这一问题阐明个人观点如下。

在客家研究中,自从罗香林先生把“客家人”称为“客家民系”以来,“客家”这个族群作为汉族的一个支系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形成了共识。但何谓“客家民系”,其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定,则至今仍言人人殊,歧义纷呈,影响客家研究的深入发展。要使客家研究取得突破,要把客家研究变成一门真正的学问,首先必须为“客家民系”下一个正确的定义。换言之,“客家民系”的界定是客家研究中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客家学”学科建设中的基础性、前提性问题。

罗香林先生提出“客家民系”概念时,主要是从种族和血统的角度来认识并论述客家民系,其观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至今仍有不少论者按照罗先生的观念处理客家源流问题。但这种理论有悖于民族学的基本常识,也无法解释客家形成发展史的大量事实,其局限性和片面性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识。

有鉴于此,自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学者试图给出比较科学的



“客家民系”定义。1991年,李逢蕊先生从民族学的角度进行了尝试,他说:“什么叫做客家呢?我以为可以概括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汉民族的独特稳定的客家民系,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具有独特稳定的客家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即客家精神)。凡符合上述稳定特征的人,就叫客家人。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客家人。”^①这样的表述,就“语言、文化、民俗和感情心态”立论,基本围绕着民族学关于民族定义的基本要素,比起种族论和血统论的观点,显然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正如王东林先生所指出的,其不足也是明显的:第一,忽略了人的因素,既未指出北方汉人的移入,也未指出土著对客家民系形成的作用;第二,忽略了时、地的因素,未能指出客家民系形成的大致时间和基本地域;第三,提法笼统,逻辑不够严密,如“语言”、“民俗”和“感情心态”都属于“文化”,以之与“文化”并列不妥,而民系使用的语言只是民族共同语言中的地域性分支,属于方言的层次,在民系概念中用“语言”作为界定的要素,容易混淆民系与民族的区别,其“语言”一项应该改为“方言”,再如“具有共同的利益”的提法,也显得含混,不准确。

^① 李逢蕊:《客家人界定初论》,《客家学研究》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我在1995年出版的《客家源流新探》中,首次提出“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其主旨也是参照定义民族的要素来界定民系。在该书绪论中,我这样写道:

“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的观念。因为种族的因素——即自北方南移的大量汉人固然是形成客家的一个因素,但单有南移的汉人还不能形成“客家”,还有待这批南移汉人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迁入某一特定地区,以其人数的优势和经济、文化的优势,同化了当地原住民,又吸收了原住民固有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迥异于当地原住民的旧文化,也不完全雷同于外来汉民原有文化的新型文化,那么这种新型文化的载体——一个新的民系,即

客家民系才得以诞生。^②

② 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绪论》，12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这一表述的优点是旗帜鲜明地否定了以种族界定客家的旧说，明确地以文化来界定客家，并且涉及了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域（某一特定地区），还强调了客家民系形成中移民（南迁汉人）与土著（原住居民）两种主要成分，指出客家民系是这两种成分互相融合、两种文化互相涵化才形成的。在本书有关章节的论述中，我还把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地域及“文化”的要素具体化：时间是唐宋时开始酝酿，到南宋时正式形成民系；地域是赣闽粤交界的山区；所谓文化，主要是指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社会心理素质，共同的方言。

这一界定目前已为不少研究者所接受，有人还专门为之作了发挥和补充论述。^①但这一界定也有不足之处。从逻辑上说，要界定“客家民系”，首先必须明确“民系”的含义，然后才谈得上“客家民系”的界定。笔者的上述界定，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其次，笔者的上述界定对于客家民系的组成成分考虑得还不充分，也未反映客家民系初步形成之后发展壮大情况。

① 罗勇：《略论客家文化的形成及其多元因素》，《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最早在界定“民系”概念的基础上为“客家”作出新诠释的是王东林先生。他认为民系不同于民族，不能夸大民系之间的差异，不能用斯大林民族定义生搬硬套民系的界定，因而他为民系给出了如下的定义：“民系是民族的区域性分支，是民族内部在民族共性覆盖下的，具有相对差异的方言以及生产、生活习俗的人类群团。”^②

② 王东林：《民系理论的初步探索——客家学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在民系理论的观照下，他抓住“时间性”、“地域性”、“民族性”这三性来认识客家民系的含义，将“客家”概念界定为：

客家是汉民族共同体的一个分支，其先民祖籍中原，自东晋至两宋之交，由于战乱等种种历史原因，陆续迁入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山区中，在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化而逐渐形成的一个具有比较独特的方言、风俗习惯及文化心态的稳定的民系。



在文章的展开论述中,王东林对其所谓三性作了比较详尽的阐发,要点如下。①客家人的祖先原本就是中原汉人,他们的迁徙属“板块转移式”。②客家的源流,就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而言,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次:第一次为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西晋永嘉丧乱,导致大量的北方流民南迁,最远者达赣中和赣南山区,或沿江南下到皖南、苏南一线;第二次为唐中叶至唐末,由于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影响,再度引起北方人民大规模的南迁;第三次为五代至两宋之交,移民主要聚居于赣南以及赣东、赣西的丘陵山区,而客家就是在这一带山区形成的民系,客家人是由北方平原居民演化而成的南方山民。

应该说,王东林的民系理论是比较科学的,可以将其作为讨论客家民系含义的前提。但他对于客家民系的定义,却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客家人的祖先原本就是中原汉人,他们的迁徙属‘板块转移式’”,“客家人是由北方平原居民演化而成的南方山民”云云,很容易使人误认为客家人只有中原汉人一个来源,南方的土著并不是客家人的祖先,他们在客家民系形成过程中不起作用或只起微不足道的作用。

第二,王东林说的第一次与第二次移民也正是罗香林先生所谓第一次与第二次移民。其实,晋永嘉之乱造成的那一波移民,实在与客家民系的形成没有直接的关系。笔者在《客家源流新探》一书中,已经援引谭其骧等先生的研究指出:

以今日的省区而论,则当时的司、豫流民,基本上移居在今河南省东南一隅、安徽省大部、江苏省西部一小部分,江西省北部一小部分。这些地区都与今日之客家基本住地无关。当时纵使有极小部分人远徙至今福建、广东境内,由于人数太少,也只能被当地土著同化掉。而罗先生所谓第一次与第二次移民之间,时间相差六七百年,其间世事沧桑,社会变化很大。特别是江淮地区,正当北朝与南朝交界之区,屡经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归属变化,

人口流动变易极大。唐末五代时江淮的人口状况,远非东晋南北朝时的旧样子,唐末五代时自江淮地区南迁的人民决不可能就是晋代迁入江淮地区移民的后裔或这些后裔的一部分。所以罗香林先生说的这第一次大移民,实际上与数百年后形成的客家并无直接的关系。^①

周振鹤、吴松弟等人也都著文阐述了客家源流只能追溯到唐中叶的观点。^②

第三,认为中原移民迁移到赣南、赣东及赣西的丘陵山区后就从平原居民演化为南方山民,根据不足。从文献记载来看,来自北方的移民经过与土著等种族长期同化演化为带有明显中原特点的南方山民,最早见于南宋时期的汀州,所以闽西山区才是客家民系初步形成时期的核心区域(详见第一章)。因此,王东林关于客家民系的界定,还需要修订和完善。

我们认为,汉族在南方的各个民系,都是在汉族向南推进过程中,由南迁汉人与当地土著及先期入迁该地的其他种族长期互动、充分融合而产生的,客家民系也不例外。因此,要给客家民系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定义,必须考虑汉族向南推进的大背景,必须究明客家民系形成的大范围和中心地域,还必须充分反映南迁汉人与当地土著及其他相关种族的互动融合情况。

根据这样的认识,对于客家民系的定义,似可作如下表述:

客家是汉族在南方的一个民系,它是在汉族对于东南和华南地区的经略基本完成,越海系、湘赣系、闽海系和南海系诸民系业已形成的情况下,继续向赣闽粤交界山区经略的结果。约略从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始,以江淮汉人为主体的北方汉人源源南迁。在东南、华南诸省平原和沿海地区都被开发殆尽的情况下,大批南迁的汉人涌入赣闽粤交界区域的山区和丘陵地带,与赣闽粤交界区域的土著及其他业已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南方少数民族,经过长期的互动融合,至南宋时彼此在文化上充分互相

① 谢重光:《客家源流新探》绪论,9—10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② 周振鹤:《客家源流异说》,《学术月刊》,1996年第3期。吴松弟:《客家南宋源流说》,《复旦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5期。



涵化 ,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既迥异于当地原住民的旧文化 ,又不完全雷同于外来汉民原有文化的新型文化 ,这种新型文化的载体就是客家民系。客家民系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而不是种族的概念。使客家人与其他民系或其他族群相区别的完全是文化的因素 ,而非种族的因素。南迁汉人、赣闽粤交界区域的土著和参与融合的相关南方少数民族都是客家先民 ,他们原有的文化都是铸造客家新文化的重要构件。客家民系在南宋初步形成以后 ,元明两代又有重大发展 ,约略至明中叶 ,其分布格局才基本稳定下来 ,其独特方言、独特风俗、独特社会心理及族群性格才充分发展成熟。

第一章 汀江流域的开发与客家民系的形成

一、中原、江淮人民迁入赣闽粤交界区域的历史回顾

如前所述,与客家民系的形成直接相关的北方汉人南迁,时间上只能追溯到唐中叶的安史之乱,所以本节关于中原、江淮人民迁入赣闽粤的历史回顾,主要探讨从安史之乱至两宋之际江淮人民向赣闽粤交界区域迁徙的情形。

唐自天宝十四年之后陷入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其后藩镇割据,边患不已,继之以唐末黄巢大起义和五代的纷争,长期的战乱和苛政、灾荒,造成生灵涂炭,人民流徙。就中尤以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为中心的关中和中原地区破坏最为惨重。透过时人的诗文,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当时人民死亡和流徙的悲惨景象。这里略引几则诗文以见其概:

李白诗曰:“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①

杜甫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②

^①《永王东巡歌十首》之二,载《全唐诗》卷167。

^②《无家别》、《逃难》,分载《全唐诗》卷217、2284页,卷234、2582页。